

西方话语体系的特点及对全球传播的影响

王澄林

海军航空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1

摘要: 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全球传播的关键推动力量, 深深根植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经济、技术和政治力量的支撑下发展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体系。其核心理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质, 对全球传播的格局与方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这一体系的形成与演进展开分析, 梳理其主要特征及在全球传播中的具体表现, 同时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所面临的挑战与局限。

关键词: 西方话语体系; 特点; 全球传播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Communication

Wang, Chenglin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driving force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traditions. Supported by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wer,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globally influential system. Its core ideas exhibit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exerting a broad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atterns and direction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is system, outline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anifestations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it fac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lobal communication

DOI: 10.62639/sspse13.20250102

西方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与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技术实力密不可分。自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通过确立“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 为全球传播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而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全球化进程, 更使得西方在传播技术和内容输出方面取得了绝对优势。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实践, 到冷战时期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操控, 再到全球化语境下借助跨国媒体和数字技术塑造舆论规则, 西方逐步将其话语体系扩展为一种全球性的标准模板。然而, 这一体系的构建既是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引发了广泛的文化排斥与传播不平等问题^[1]。随着非西方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快速崛起, 全球传播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与重塑, 为分析西方话语体系的特点及其全球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西方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话语体系的形成是多重历史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逐步确立了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的价值观, 并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 将这些理念注入全球范围的文化和传播秩序中。

(一) 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生成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宣传作为重要的传

播工具,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得到充分运用。战时的广播、报纸和电影成为塑造公众舆论、协调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这一阶段, 西方话语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控制性”和“工具性”, 旨在通过传播塑造国家认同与敌我区隔。

(二)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传播

冷战期间, 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以“自由世界”为口号, 通过现代化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 西方成功将其价值观与现代性话语捆绑, 并以文化帝国主义为手段, 形成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支配。希伯特等学者的研究框架将“自由市场”和“社会责任”理论美化为普适原则, 成为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基石。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市场化转型

冷战后, 西方话语体系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向市场化话语转型。新自由主义成为传播的主导思想, 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网络传播兴起后, 西方借助其在操作系统、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等“二级基础设施”中的绝对优势, 继续强化其全球话语权^[2]。

二、西方话语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 核心理念的抽象化与普世化

西方话语体系始终致力于打造一套高度抽象化的价值框架, 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概念, 既带有强烈的普世号召力, 又具

(稿件编号: SE-25-2-1021)

作者简介: 王澄林 (1989-), 男, 汉, 辽宁省沈阳市,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学, 语料库, 国际关系, 话语分析。

有模糊的适应性。这些理念在学术、教育和媒体领域的广泛传播, 赋予其一种跨越文化与语境的流通能力。然而, 这种普世化的构建并非毫无偏颇。事实上, 所谓的“普世”常常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逻辑外推至全球。从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到今天的“全球民主化”, 这一套话语策略巧妙地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包装为“中立的普世”, 实际上却将其他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排除在外^[3]。这样的抽象化既为西方话语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也使其很难逃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 特别是在涉及非西方社会的语境时, 其对多样性的不敏感性显得尤为突出。

(二) 传播路径的系统性与技术性结合

西方在全球传播中的影响力,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传播基础设施的掌控力。从海底光缆到通讯卫星, 再到如 YouTube、Facebook 这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这种基础设施既是现代传播的硬件支持, 又是技术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布局上的领先, 使其不仅掌握了内容的生产权, 还牢牢占据着传播路径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 这种技术和系统的结合并非仅限于物质层面, 它还涉及规则的构建和叙事的传播。

(三) 话语与权力的深度绑定

在西方话语体系的构造中, 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议题。正如福柯所言, 话语不仅承载着表达的功能, 更是权力得以运作的关键工具。从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 到当下对俄乌冲突的舆论主导, 西方一直在通过话语来重构国际秩序^[4]。所谓的“自由”与“专制”“民主”与“侵略”等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 不仅定义了国际政治中的敌我关系, 也为其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干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话语权的深度绑定, 使得西方国家能够在全球传播中既塑造议题, 又通过控制叙事逻辑来确保自身的利益。换言之, 西方话语体系并非单纯的交流机制, 而是一种将话语转化为行动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复杂权力网络。

(四) 灵活性与适应性

西方话语体系的独特之处, 还在于其灵活应变的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文化环境, 西方话语总能吸纳新的元素并将其整合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女权主义崛起, 到近年来针对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视, 西方将这些原本的“边缘话语”纳入主流, 不仅拓展了自身的价值体系, 也增强了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吸引力。这种更新机制赋予西方话语体系更大的延展性, 使其能够在保持核心框架的同时, 适应多样化的社会诉求。然而, 这种灵活性并非单纯为了追求平等, 而是基于延续话语权的需要。西方通过不断吸纳和重塑话语内容, 既强化了其体系的开放性形象, 也

在实际操作中继续维护了其中心地位。

三、西方话语体系对全球传播的影响

(一) 推动全球传播秩序的形成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明与扩展, 多由西方国家主导。尤其是以英语为核心的传播语言体系, 已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要媒介, 使得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这种“标准模板”式的传播格局在提升信息流通效率的同时, 也造成了多样性表达的压缩。非西方语言与文化在这一语境下被边缘化, 逐渐被归入“他者”的范畴。尽管这种单一化体系为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 但却牺牲了文化多样性和本土化表达的可能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话语上的文化霸权^[5]。从本质上看, 这种传播秩序不是平等协商的结果, 而是技术、资本与权力共同作用的产物。西方语言与文化被定义为“中心”, 其他地区的表达则在这一体系中成为需要“翻译”的外围。这种结构虽然稳固, 但其内在的不平衡性为非西方国家的反思与突破提供了空间。

(二) 塑造国际舆论场的规则

西方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依靠其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全面掌控, 形成了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事件报道的内容和方向上, 还渗透到舆论的整体框架和规则的构建中。以俄乌冲突为例, 西方通过封锁俄罗斯的媒体传播渠道, 并大力支持乌克兰的舆论声势,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叙事框架。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的话语体系并非单向的传播工具, 而是一种多层次协同的体系。它不仅涵盖了政府的政策表述, 还延伸到企业、媒体和社会个人的联动。同频共振的传播机制, 使西方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领域、跨主体的高度一致。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一种“自由”表达, 实质上是基于技术垄断和规则设定的主导权强化。

(三) 加剧传播的不平等

全球传播的不平等问题, 根源在于西方话语体系在技术、内容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 还是数字媒体时代的算法分发, 西方始终牢牢控制着传播链条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传播技术的创新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长期处于话语体系的边缘。这样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西方传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直接结果。即使在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 这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西方通过掌控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等传播节点, 对内容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施加深远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虽在传播路径上实现了部分突破, 但其内容和议题的独立性仍受到西方框架的约束。在这一意义上, 全球传播的不平等不仅是技术的产物, 更是资本与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 引发多极化传播格局的反思

随着非西方国家话语意识的觉醒, 西方话语体系的单一主导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突破西方的话语框架, 探索更加符合本土文化特质和全球多样性需求的传播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 旨在倡导一种多元、公平的传播秩序。这种理念的提出, 不仅反映了对现存话语体系不平等的深刻反思, 也体现了非西方国家对未来全球传播秩序的期望。在这一过程中, 非西方国家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努力创造能够表达本土声音的传播平台。这样的趋势虽然尚未对西方的主导地位构成根本性冲击, 但已显现出多极化传播格局的雏形。从长远来看, 这种多极化趋势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 为全球传播注入更多元的视角与力量。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 技术进步与权力重塑

新兴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全球传播的权力格局,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分发等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对传播的主导权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西方国家依然在技术创新和传播规则制定中占据核心位置, 但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正在为这一格局注入新的变量。例如, 中国通过推动短视频平台、搜索引擎和电商直播等本土技术输出, 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话语空间。然而, 仅依靠技术输出并不足以真正改变权力格局, 这需要更加多元化的策略支持。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应投入更多资源建设本土技术生态体系, 增强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力。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需要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以提升国际用户的认同感和黏性。此外, 这些国家还应推动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技术规则的讨论与制定, 以避免被排除在技术治理的主流框架之外。只有在技术自主性与全球协作之间找到平衡, 权力重塑才能真正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二) 文化多样性与普世话语的冲突

西方话语体系的普世化倾向固然提供了一种看似便利的交流框架, 但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很容易引发文化上的排斥感和反弹情绪。文化多样性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 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标准化”与“本土化”的矛盾。许多非西方国家在面对普世化的压力时, 往往会产生文化危机感, 认为自身的传统被边缘化甚至弱化。这种紧张关系需要通过双向交流和多元包容来化解。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复兴和现代化本土文化, 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此外, 政府和文化机构应支持本地艺术、电影和文学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展示, 以形成独特的话语内容。在全球化的平台上, 非西方国家还需要寻找与西方对话的方式, 而不是一味地抗拒或模仿。国际社会则需要构建

更加包容的话语框架, 鼓励多样性表达, 并减少对非西方文化的刻板化定义。只有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文化多样性与普世化的矛盾才能得到缓解。

(三) 推动国际传播秩序的再平衡

全球传播的不平等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其背后是技术资源、传播能力以及话语权的长期失衡。要改变这种现状, 非西方国家首先需要打牢基础设施这一关键。通过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5G 网络以及数字平台的投入, 提升传播通道的覆盖范围和技术水平, 可以为本土声音的传播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 传播人才的培养同样重要。在这一方面, 非西方国家可以建立针对国际传播的专项教育项目, 帮助年轻一代掌握跨文化传播技能与数字化传播技术。此外, 本土价值观的输出不应流于表面, 而应注重内容的深度与创新。例如, 非西方国家可以挖掘本土故事、历史与哲学资源, 创造具有普适意义和吸引力的内容。在全球层面, 推动多边合作是实现传播秩序再平衡的重要策略, 发展中国家可以联合倡导文化平等的传播原则, 并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和传播组织的事务, 以推动规则的重新制定。

五、结论

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全球传播的主导力量, 其特点在于理念的普世化、路径的系统化以及与权力的深度结合。这种体系对全球传播既产生了推动作用, 也加剧了传播的不平等。面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挑战, 非西方国家需要构建更具主体性的传播话语体系, 推动多元、公平的全球传播秩序。在未来, 全球传播的竞争将不仅是技术和经济的较量, 更是话语权和价值观的博弈。

参考文献:

- [1] 沈国麟, 易若彤. 同频共振: 西方战略传播的基础设施和话语体系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0 (02): 49-58.
- [2] 周文, 何雨晴.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01): 52-61.
- [3] 王天琪, 朴雪涛. 西方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冲突与融合 (1899—1949) [J]. 煤炭高等教育, 2022, 40 (03): 89-96.
- [4] 郭彦. 走出西方话语体系禁锢: 比较法视野中的人民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研究 [J]. 法律适用, 2022, (05): 122-129.
- [5] 李继东, 姜楠. 西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国家身份的建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2 (02): 152-158+187-188.